

貴州報道

改革開放貴州報告 節點篇

頂雲：改革符號的前世今生



■經過「打包經營」，將土地流轉到種植大戶手中，當地農業發展呈現一片欣欣向榮。圖為頂雲鄉的一片蔬菜基地。 頂雲鄉政府供圖

改革符號的現實圖景

距離縣城關嶺 18 分鐘車程，距老滬昆公路 320 國道僅 8 公裏，這是頂雲鄉的地理位置。時至今日，仍有人不時來頂雲尋找當年的影子，不過大多數會失望而歸。

30 多年前曾經引以為豪的「頂雲經驗」，除了被噴成宣傳頁懸掛在鄉黨委辦公室外，也就只有田地間聳立起來的一塊孤零零的「頂雲經驗」紀念碑，碑上刻有當時《貴州日報》三篇報道的節選。

「改革先驅」艱難度日

被人戲稱為「改革先驅」的陶天銀是健在的 4 位老人中最年長的一位，也是生活最貧困的。一間昏暗狹小的老房子，沒有一件像樣的傢具。

一年多前，由於一場大病，老人身體每況愈下，無力種莊稼。兒子兒媳又常年在外打工，只能將四畝土地租給別人，如今老人所有的經濟收入，就是一年不到 2000 元的土地租金、農村低保，以及外出務工兒子每個月寄回來的兩三百元錢。

同陶天銀一樣，當年的幾位歷史親歷者，現在大多離開了幾十年賴以生存的土地。而在整個陶家寨，佔據人口三分之一的勞力已改變了謀生渠道，他們大多外出務工，留下老人和孩子。成片的土地祇能荒蕪，或租給別人經營。

據了解，目前頂雲鄉的農民人均收入僅為 1732 左右，也就是關嶺縣的平均水平。但是，基礎設施建設還很落後，16 個行政村僅有 5 個村通油路，只覆蓋了 40% 左右的人口，有 3 個村還是近兩年才實現通車的。

王保民：窮根在改革力度不够



■貴州日報前總編輯王保民表示，頂雲成為改革典型，有其必然性和偶然性。 虎靜攝

1982 年，時任貴州日報常務副總編的王保民一次考察前往頂雲，在他眼中的頂雲同樣是掙扎在貧困錢上。「當年汽車開到一個大壩裏，突然從四面八方跑過來很多小孩，大概有四五十個，圍着汽車看了半天」。王保民的第一感想是，這麼多的孩子，吃飯問題可不好解決啊。

為何在中央已經肯定「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後，分產到戶已經五六年的頂雲還這麼窮？王保民分析：縱向對比，頂雲是比過去日子好過。但是橫向上來看，因改革停止或力度不够，導致與周邊區域相比仍然「貧窮落後」。當然，這也與當地處於領導關注視綫之外有關。

「當年的改革先行者，現在還更需要改革，還需要進一步的改革開放，才能真正徹底的改變面貌。」王保民說，自然，這些農民不具有繼續改革的「義務」。

頂雲呼聲：再改革 拔窮根

時至今日，時移世易。為充分利用好農村土地資源，走農業生產規模化、產業化道路，創造了「頂雲經驗」的頂雲鄉實行土地「打包經營」，再次走到了探索土地有效利用的前沿。

據頂雲鄉黨委書記金開虎介紹，從 2004 年至 2006 年，頂雲鄉已經進行了「三年三嘗試」，第一年集中了農戶的土地 100 畝、第二年 200 畝、第三年 300 畝，分別選擇種植大戶或科技能手進行「打包經營」種植西紅柿。農戶從承包經營者手中收取土地租金，再到經營者的地裏「打工」掙工錢。

到目前為止，關嶺自治縣土地流轉「規模經營」模式在全縣蓬勃發展起來。2007 年以來，花江鎮、八德鄉、關索鎮、坡貢鎮等 13 個鄉鎮 600 多名種植能手出面租地經營，形成規模種植的土地面積達到 3 萬餘畝，先後建成了斷橋早菜基地、新鋪西瓜基地、板貴花椒基地、坡貢生薑基地、永寧、頂雲晚秋淡季蔬菜基地、花江蠶桑種植基地等 120 餘個規模種植基地。3 萬餘畝土地為當地群眾增加純收入 4000 多萬元。



■陶家寨目前還健在的四位「改革先驅」重回當年秘密簽訂協議的「燈盞凹」。從左至右分別為：陳高忠、陳忠富、陶天銀、羅定堯。（頂雲鄉政府供圖）

「什麼時候抓了改革開放，發展就提速；什麼時候不抓改革開放，發展就停滯不前。」在此間召開的貴州省改革開放工作會議上，貴州省長趙克志在詮釋「改革開放」與「發展」的關係時，特意提及 1976 年的關嶺縣頂雲公社。

頂雲，這個原本默默無聞的地方，如何與安徽小崗村一起成為名噪一時的改革典型？「定產到組」又是如何興起的？這個曾經具有「符號性意義」的地方如今發展現狀又如何？

36 年後，本報記者走進了頂雲鄉。

香港文匯報記者 路艷寧、虎靜，實習記者 溫志超 關嶺報道

肚皮問題引發「保密協議」

「為了讓陶家寨老幼能吃飽飯，我們將全生產隊田地分到各家各戶。如果誰因此事進班房，這家人的生產生活由大家負擔；誰要說出去，天打雷劈，大家攆他滾出陶家寨。」關嶺縣頂雲鄉陶家寨，當年「頂雲公社」陶家寨生產隊隊長陳高忠憑記憶口述了那份「保密協議」。

這份「保密協議」後來成為整個村寨在困難時期填飽肚子的重要支撐力量。陳高忠是當時簽訂「保密協議」的 7 位主事者之一。當年的「老夥伴」有 3 位已經過世，如今只剩下陳忠富、羅定堯、陶天銀和自己。

談及簽訂「保密協議」，老人們一肚子苦水：為什麼要分？實在是活不下去了。陳高忠回憶，人民公社搞了七、八年，社員出工拖拖拉拉，前面的人到了地頭，後面的人還在家裏。窩工現象嚴重，活也幹得馬虎，導致糧食收成一年不如一年。

「1975 年以前，糧食省着吃，也只够半年。要往裏面加谷糠、樹皮、野菜才能勉強够吃，但是吃了糠消化不了，肚子脹得難受。我大兒子也餓死了。」回憶起那一幕，陳忠富不禁哽咽起來。

「人要活下來，飯總要吃飽啊！怎麼辦？只能自己救自己。」陳高忠自問自答。幹了一輩子農活的他深知只有給自己幹，才「渾身有力氣」，但這又違反上面的規定。如何能夠讓大家吃飽飯又自己又不坐牢？他漸漸萌生了一個想法。

「大逆不道」的包產到戶

接下來的幾天，陳高忠分別與陳忠富、李國昌、羅定堯、羅明才、羅國明、陶天銀等幾位自己能說得上話、信得過的老鄉私下碰頭，研究「簽個協議」。而這幾位基本都是寨裏羅、陶、陳等幾大姓的代表。

陶家寨的後山，有一塊 100 來平米、被當地人稱為「燈盞凹」的凹地，寬闊且隱蔽。1977 年 3 月初，陳忠富等 7 人冒着「批鬥」、「坐牢」的危險，在這塊凹地上簽下了本文開頭的「保密協議」。

當天深夜，他們將一張寫下全生產隊 30 戶人家名字的牛皮紙挨家挨戶送上門，分別由各自的戶主打上了「手模印」。從此，頂雲公社陶家寨生產隊的土地實行了「包產到戶」。

以後，只要有人到此檢查生產，大家就集體出工幹活，回家後再計算換工賬。另外，他們還編造了一套工分冊、收支賬和年終結算分配表，以應付檢查。

1977 年，安順地區的糧食生產總量還是很低，群眾吃飯仍成問題。但由於「包產到戶」，陶家寨糧食生產大豐收，不僅各家各戶有餘糧，個別膽大的群眾還悄悄將糧食背到永寧、花江等地集市上去賣。

差不多同一時期，頂雲鄉又有 16 個生產隊實行「包產到戶」，糧食平均產量比前一年增長三成，

在大災之年創造了糧食產量歷史最高水平，人均收入從幾十元增加到兩百多元。

「典型」誕生一波三折

1978 年 11 月 11 日，貴州省報《貴州日報》在頭版頭條發表了《頂雲公社：「定產到組」姓「社」不姓「資」》、《「定產到組，超產獎勵」行之有效》等三篇報道，並加上編者按，旗幟鮮明地肯定「頂雲經驗」。

代表官方態度的《貴州日報》這三篇報道，如同在社會上放了一顆原子彈，引起兩種截然不同的爭論：有的官員囿於傳統的認識，對此相當抵觸，甚至有的縣在開電話會議時說貴州日報在「搞復辟」。而更多的群眾則說這是貴州日報最值錢的報紙，有的農民用紅紙把這報紙包好，放在箱子底下，為自己搞「單幹」壯膽，有的郵遞員拿着這種報紙對農民說：「給你們送糧食來了。」

為人所不知的是，時任貴州省委副書記的王朝文後來在《省委是怎樣下決心允許包幹到戶的》文章中透露：當時農民要求單幹，領導不許要求糾偏，結果就是農民罷耕。幾個省委常委，在不要工作人員不要秘書不要記錄的情況下開會討論，結果是承認現狀，停止糾偏。

為填飽肚皮而做出的「包產到戶」選擇，却因順應時代要求而被樹立成「典型」推廣，這或許是在陳忠富等幾位老人的意料之外。這表面上看一舉兩得，實質也是百般無奈下的選擇。



■陳高忠認為，不是他們有改革的眼光，而是「被肚子餓逼出來的」。 王嫻攝

改革典型：歷史的必然與偶然

其實，在陶家寨的 7 戶農民極為隱蔽地按手印簽下「保密合約」時，頂雲周邊的一些地區已經或多或少邁出了「定產到組、包產到戶」的步伐。在歷史見證者、時任《貴州日報》常務副總編的王保民看來，「30 多年前，頂雲鄉搞「單幹」，既不是第一也不是唯一。至於為什麼成為了改革典型，有它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改革地區處於領導視綫之外

1978 年以前，中央是反對搞土地分產到戶的，批劉少奇和鄧子恢都是為此。但實際上全國很多地方名義上是集體制，私下都是在搞責任制。王保民回憶：「當時，四川就是因為搞責任制而撤了兩個地委書記。貴州鎮寧縣的六馬、普安等地私底下其實都已開始將土地包產到戶。」

改還是不改，這是個問題。甚至作為政治風向標的《人民日報》，今天登個群眾來信說贊成單幹，明天有個群眾來信說不贊成，沒有敢拿出一個明確意見。

王保民總結，這些私底下實行土地改革的地方有許多共同點：特別窮，交通落後，生活在領導視綫模糊處。不過，這也給他們偷偷實實包產到戶提供了現實可能。在經濟發達、交通便捷的地方，領導常常去視察，他們也不敢搞「單幹」。

時任高層肯定「頂雲經驗」

「頂雲作為一個典型被發現有很多的機遇。」王保民回憶，「1978 年的 10 月底，當時的貴

州省委書記馬力到興義去檢查工作，回程中臨時在關嶺停留大半天。」當時的關嶺縣委書記李清泉與副書記黃學境向馬力匯報了集體生活好、集體生產如何鞏固提高一類的套話。

在閒隙休息時，兩個書記私下琢磨，要不要把頂雲的特殊情況匯報下。王保民回憶，當時李清泉很志志，吞吞吐吐地說「有個頂雲公社在搞責任制，好像還不錯，糧食也增產。」邊說邊觀察領導的態度，擔心會不會因為此時把二人給撤了。

結果當時馬力的回答令李清泉如釋重負，「也可以嘛。你們可以寫一個材料交給我。」後經一次省委常委會，馬力談及關嶺有個地方搞個實驗，搞責任制，搞定產到組，還不錯，這個做法還可以。

「頂雲典型」是個巧合

王保民介紹，其實當時省報實際上準備了七八篇稿子，準備接連發。可是，正逢馬力到北京開會。在貴州主持工作的領導摸不清楚一把手的態度，所以最終不同意再發，餘下文章也就沒有面世。「但是，這三篇稿件已經引起了強烈的反響。」王保民說。

在王保民看來，「因為種種機遇，所以選擇了頂雲，並不是頂雲有多突出，李清泉當時也是順口帶出，主要是探領導的口風，領導說可以嘛，結果就搞了。頂雲之所以是典型，一切都是歷史的巧合。」



■矗立在田間的頂雲經驗紀念碑，似乎仍向人們訴說往日改革者的「大膽之舉」。 王嫻攝